

清史

论集

上

QINGSHI LUNJI

陈捷先 成崇德 李纪祥 主编



人民出版社

清史

论集

上

QINGSHI LUNJI

陈捷先 成崇德 李纪祥 主编



人民出版社

策 划：杨松岩
文字编辑：侯俊智 杨松岩
装帧设计：肖 辉
责任校对：刘金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论集/陈捷先 成崇德 李纪祥主编.

-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9

ISBN 7-01-005636-6

I. 清… II. ①陈…②成…③李… III. 中国-古代史 -清代-文集 IV. K249.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65103 号

清史论集

QINGSHYLUNJI

（上、下卷）

陈捷先 成崇德 李纪祥主编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71.25 插页：8

字数：1280 千字 印数：3,000 册

ISBN 7-01-005636-6/K 定价：160.00 元

前 言

中国历史上不少皇朝为少数民族所建立,其中以满族建立之清朝最为成功。清朝统治中国 268 年,其间对中国疆土之开扩,民族之融合,贡献至多,对整理、保存、弘扬中华文化之贡献亦大。同时清朝为帝制中国之最后朝代,亦系中国由旧变新、由强变弱、由独立变次殖民地、由专制变民主之转捩时代,其在整个中国史上具有承先启后之作用与地位。

台湾于康熙二十二年(1668 年)为清军收复,翌年设一府三县,隶福建省,其后 200 多年之中,在清廷统治下,人口增多,土地开辟,生产进步,文化提升,一切开发事业,均与中国内地有密不可分之关系,故清史研究向为治台湾史者所重视。然而近数年来,岛内因教育改革及政治因素,情势大异于前。即以现今大专院校清史教学而言,160 多所学校中,讲授清史课程者为数不足十所,而台湾史之研究则为显学,殊不知研究台湾史而不重清史研究,实属缺陷,亦必不能竟其全功者。

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即以提倡清史教学研究为主要课题,近年来无论在师资之聘请,课程之安排,图书之采购,活动之策划诸方面均以清史研究为第一优先,以期对台湾学界清史不被重视而日渐衰微现象有所补救。

基于以上诸因,该所于 2003 年 10 月在台湾宜兰县礁溪乡校区召开清史学术研讨会,邀请两岸清史名家及部分海外学者与会,进行学术交流,以集思广益,为清史高深研究建新里程碑。

会议于 10 月 27 日揭幕,29 日闭幕,并于会议期间及会后,分别在宜兰礁溪与台北两地举行清史纂修恳谈会两次。参加历次会议者均有百人以上,会议中宣读之学术论文多达 60 余篇,包括清代帝王、文化思想、社会经济、清代台湾、满族满语、档案文献等等,可谓万象包罗,琳琅满目,为台湾清史学界未见之盛会。

大会另一特色为大陆专家参加者人数甚多,尤以戴逸教授率领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成员近 20 人与会,实为此次大会之最大光宠。

会议结束经年之后,各篇论文业经与会学者分别订正,本所原拟付梓刊行,惟本校三易校长,筹款困难,成书计划遂成泡影。2004年10月,本人率本所师生十数人赴北京,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现已升格为学院)签订合作计划时,偶与成崇德教授谈及此事,成教授乃代向戴逸、马大正、朱诚如诸先生转告,戴先生等为成就本所同仁心愿,慨允赞助出版。孟超先生在印制业务上亦自愿帮忙,故会议论文集之出书问世,实以上诸先生大力协助之结果,本人在此谨志数语,以表谢忱。

陈捷先

(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学研究所教授)

目 录

清代史

戴 逸	谈清史纂修·····	3
马大正	世界视野与清史纂修工程·····	8
于 沛	关于纂修清史“世界眼光”的思考·····	15
赵志强	清太宗“称帝”考·····	19
阎崇年	清太宗经略索伦辨·····	33
王思治	“鐏匣”与旻宁(道光帝)继统·····	49
徐晓望	清军入闽与郑芝龙降清事考·····	55
张杰夫	关于雍正另辟西陵原因的思考·····	69
陈捷先	康熙好色·····	73
郭美兰	康熙帝与多伦诺尔汇宗寺·····	80
林天人	清代河防政策及河工研究——以靳辅的治河为考察重心·····	88
郭成康	乾隆皇帝诞生地考——从最近公布的一则清宫档案说起·····	109
冯尔康	从召见臣工看道光帝、咸丰帝的理政和性格——以召见张集馨、 段光清为例·····	123
周积明	《四库全书总目》与乾嘉时期兼采汉宋思潮·····	138
姜 涛	晚清史:一身而二任·····	152
林文仁	“官常”与“权力”的语言考察——以《翁同和日记》为例·····	163
查时杰	从再建到没落——清代开封犹太会堂盛衰·····	192
陈宗仁	“公司”源流初探——兼论明清时代商船的人员结构及其隶属关系 ·····	208
陈支平	清代泉州福全所的众姓合族·····	225

杨彦杰	“林日茂”家族及其文化	234
-----	-------------------	-----

清代台湾

郑喜夫	郑芝龙对郑清和议之态度及影响	251
杨国楨	林则徐眼中的台湾	274
卓克华	鹿港金门馆之历史研究——一座清代“班兵伙馆”的新发现	285
唐羽	清乾嘉间吴沙在三貂之垦务	310
徐裕健	台湾传统建筑大木匠艺史料图文手稿架构之剖析 ——以清末来台大木匠师王益顺匠派为个案	335

旗人旗地

韦庆远	《庄头家谱》与清代对旗地的管理	353
刘小萌	内务府世家的类型及其婚姻关系	372
叶高树	深维根本之重:雍正时代整饬旗务初探	398
王丹	清初“旗民分居”政策对北京文化的影响	423
韩世明	清入关前女真族(满族)家庭形态研究	437

清代学术与艺术

龚书铎	清嘉道间汉宋学关系小议	451
尹章义	以清修《明史》与当代台湾官方修史所作的比较研究	454
戴晋新	陈寅恪对清代史学的评论及其相关问题	468
李纪祥	“清史儒林传”纂修之学术史反思 ——由《国朝汉学师承记》到《清代学术概论》	480
刘仲华	孙承泽及其学术生涯	506
嵇若昕	乾隆朝内务府造办处南匠薪资及其相关问题研究	519
张丽端	常以艺事咨之 ——从御制《玉杯记》论乾隆皇帝友善对待宫廷匠人的一面	576
王耀庭	从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清档杂记盛清早期的宫廷绘画	596

清代史



谈清史纂修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戴 逸

这次我们清史编纂委员会来到风光秀丽的台湾宜兰,向台湾的学者请教,我们正在启动清史编纂工程,设计全书的框架结构,讨论全书的体例体裁。清史编纂工作从2003年年初开始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工作进展是比较正常的,我们也碰到了很多问题,也有一些初步的想法,这些想法是否适当,也要向台湾的同行们请教。台湾的许多学者对清史有很深入的研究,有很好的著作。我想,纂修清史是海峡两岸学者的共同事业,我们非常期望台湾学者的支持和参与,能够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希望这项工程在一开始就设计得比较完善。

我们为什么要纂修清史呢?政府为什么要投入这么大财力、人力支持学者们修史呢?我想,这是看到了历史学的重要性。中国是历史学非常发达的国家,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再早还有《尚书》、《左传》等史书,司马迁《史记》从五帝世家开始,历史非常悠久。而且我们从商周就有了甲骨文,以后历朝历代都有历史记载,从来没有中断过,这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是任何一个国家所没有的。所以,中国被称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历史,因为历史是人类对自己过去的回忆和反思,人类的智慧、知识都是从过去的实践经验中获取的,这种历史的回忆和反思也使我们认识到人类的自身,也使我们有了创造新生活的能力和信心。如果忘掉了历史、丢掉了历史,就不知道自己的来历,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丢失了自己的过去,忘记了自己的祖先,也就不可能开辟自己美好的未来。我想中国人懂得这一点。因此,中国人非常重视自己的历史,希望用过去生动的事实,用过去丰富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和培养我们的子孙后代。中国有一个好的传统:“易代修史”。朝代改变了,新的朝代就要为已经覆亡的朝代修史,就是要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唐太宗曾经说过:“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唐太宗讲得很有道理。

清朝统治中国有 268 年之久,清朝灭亡也有了 90 多年,但至今还没有一部详细、令人满意的清史,这是非常遗憾的。所以,易代修史这个任务我们一定要担当起来。当然有个《清史稿》,这部书也有一定的价值,有史料价值、文献价值。《清史稿》主要是依据过去国史馆的档案、稿本来修纂的,这些稿本经过了很多作者长年累月地编写,再三修改而成的,《清史稿》吸收了这些成果,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还存在不可讳言的缺点,一个是观点上的问题,对辛亥革命抱有偏见,把起义称作“作乱”,把革命党人称作“匪类”,等等。甚至孙中山的名字只在《清史稿》出现过一次,就是慈禧太后通缉他的时候把孙文的名字写进去了。连 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都没有孙中山的名字,《清史稿》记载了这件事,但没有孙中山,到底选举的谁啊?没有说。这就是所谓春秋笔法,看来《清史稿》不愿意将孙中山的名字写进去,所以观点上有问题。其次就是史事上错误很多。台湾的学者们花了很大努力写了《清史稿校注》,校正了《清史稿》的很多错误。最近我简单地翻了翻这本书。我没有这本书,也是借来看的。确实是校勘精密,内容丰富,我很钦佩各位先生,做了那么好的工作。所以,我给清史编纂工作的同志们说,要人手一册,我们写的时候,可不能再犯《清史稿校注》已经指出的错误。《清史稿》错误很多,我也曾看到过一个很幼稚、很初级的错误。在太平天国的时候太平军包围了浙江诸暨的包村,在太平军打下以后,说杀了村民 60 万人,啊呀,这个你不用核对史料,一看就知道这是错误,这个村子只是浙江一个小小的村庄,当时整个杭州可能还不到 60 万人,一个村庄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呢!这类错误可能很多。还有,《清史稿》利用了国史馆的档案,但没有利用大内档案,当时也不可能、也不知道大内的档案。由于这些原因,《清史稿》存在着不少缺点,不能令人满意,当然它自己也说自己是“稿”,并不是定本。

《清史稿》成书以后,上个世纪内多次提出要重修清史。我记得,抗日战争以前,国民党曾拨款 50 万元要修清史,但由于抗战爆发,没有能够启动。台湾方面在 1961 年由张其昀先生领衔主编,修清史,萧一山等都参加了,这就是国防研究院的《清史》。这部书是在利用《清史稿》的基础上,做了重要的修改,不是重新编写,所以张先生在序言中说:“网罗有清一代的文献,完成理想中的新清史,寄厚望于后来之作家。”他希望后人来完成,并没有说自己已经完成了。1978 年,钱穆先生建议写一部《清史稿校注》,利用在台湾的档案和其他史料来校正《清史稿》的错误。后来出版了十五大册,工程很大,2 200 多万字,远远超过了《清史稿》的 800 万字。今天就有很多先生,像冯明珠先生、陈捷先先生、庄吉发先生都参加了当年的《清史稿校注》。

大陆方面也非常重视清史纂修,解放之初,董必武先生第一个提出要修清史。以后,1959 年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先生着手制定纂修清史的规划,这件事我参与了,当

时搞清史的人很少,我也是搞近代史的。吴晗先生找到我,商量清史纂修规划,吴晗先生讲的规模很大,超过我们现在的清史纂修的规划。由于当时人才缺乏,就从培养人才作起,要从本科学生中抽调人才。但后来三年困难,这件事情停了下来。1965年周恩来委托当时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筹备成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当时就是这个名称,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著名明清史专家郭影秋为主任,并在人民大学内成立清史研究所。当时房子都看了,准备启动了。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受到冲击,又停止了,而且“文化大革命”中“修清史”还成了一条罪状。人民大学一直保持着清史研究的力量,而且一直保存下来了。到了1981年,邓小平转发了一封人民来信,建议编纂清史,后来由于“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千头万绪,还顾不上,也没有支持修史的经济力量,又拖下来,而且一拖就是20年。所以,在大陆修清史也是几起几落,路途坎坷曲折,这几次我都始终参加了,第一次参加时我才33岁。到2001年,学术界再次呼吁修清史,这次政府郑重考虑了,也调查了很长时间。到2002年底成立了清史编纂委员会,决定启动,得到了中央几个主要领导人的批准。

由此可见,清史纂修是两岸长期以来十分关心的问题,好几次都流产了,但都希望有一部清史,这是两岸共同关心并为之奋斗的目标。清代历史离开我们不远,时间很近,清史对我们特别重要,许多历史上的问题与现实密切相关。今天的经济问题,我们今天为什么发奋努力要实现现代化,就是因为清朝历史上中华民族受尽了欺负。还有人口问题,历史上的人口记录也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多,在清以前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达到过一个亿,最高也只有七八千万,当然历史记录与实际有出入,人口的迅速增长是在清代,增长到四亿多。为什么增长这样快,只有研究清史才能解释清楚。又如,外交问题,划分边界,中英问题、中俄边界问题、与日本的钓鱼岛问题,这都是清代遗留下来的问题。又如民族问题、民族关系问题,也是清代遗留下来的问题。清代处理民族问题有成功的地方,但也留下了很多问题。因此,如果要了解今天的现实,了解中国的国情,就必须了解清史,今天的很多现实问题都要追溯到清代的历史。以台湾为例,台湾是清代发展最晚的地区,也是清朝历史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以前关于台湾的历史记载,我们可以追溯到三国孙吴时期,以后隋、唐、宋、元不断有历史记载,而且以前人口比较少。但到了清朝,历史发生的一件大事就是郑成功驱逐荷兰人,这是中国人民反对西方侵略斗争的第一次,当然要在清朝历史上大书特书。康熙二十二年收复台湾,这也是大事,平定三藩以后收复台湾,清政府没有后顾之忧了,以后战略重点就放到了西北。康熙收复台湾以后,很多福建、广东的移民到了台湾,开发台湾。台湾当时大约只有7万人口,可是后来迅速增加,到甲午战争前夕达到了225万人口。自然生长没有这么快,大多都是大陆来的移民,他们辛勤劳动,开发了

这片土地。这些开发台湾的先民其种族、血统都是中国的,是炎黄子孙,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风俗也都是中国的。当时的台湾历史就是中国人在这个岛上的活动,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清史要大书特书台湾开发和被荷兰、日本侵略的历史。

以上我讲了两岸对清史的关注和清史的重要性。我们编纂清史的方针是:要实事求是,探求历史的真实,写出客观真实的历史。求真求实这是历史学的生命,要反对想当然,更要反对任意地篡改,反对隐瞒历史。当然,追求历史真实很不容易。暂且不说故意伪造历史,即使是真正抱着科学研究的态度,也还不容易做到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因为历史非常复杂,同一个事件可能有相互矛盾的记载,也可能有各种完全不同的说法。由于研究者的时代不同,观点不同,掌握史料不同,所以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之下,也还会有不同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尊重不同的意见,相互交流,深入探讨。写一部历史书,当然要有大体一致认同的观点,但并不是定于一尊,并不是抹煞不同的观点。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有时候你认为是真理,其实可能是谬误,有时候你认为是谬误,却可能包含着真理。因此,我们的方针是实事求是,追求历史真实,尊重历史真实,尊重不同意见,而不能抹煞不同意见。

编纂清史是个学术问题,要代表 21 世纪的水平。我们准备用十年的时间编纂这部清史,十年以后还会有人继续研究清史,而且必然是后来居上,成就肯定会超过我们。我们这部清史不是最好的清史,将来会有更好的清史,否则历史学就不能进步了。我们力求达到这个时代的最高水平,但并不是完美无缺,我们会有时代的局限性。另外,我们编的这部书以叙事为主,尽量少发议论。历史著作的功能就是记录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不必要多发议论,读者从一部叙述历史真实的书中会有自己的判断,要相信读者,给读者留下足够思考、判断的空间。当然,完全没有议论也不可能。从前的史书也有“太史公曰”、“臣光曰”这一类的评论,这都是观点。因为,历史学家对历史的认识本身就包含着历史学家自己的认识和判断,如何叙述,如何写,用哪些事实,这本身就包含有价值判断。所以写作时不可避免要带有观点,带有价值判断。比如我们身经抗日战争的这些人,如果让我们写抗日战争历史,一定是带着自己的判断,带着自己的是非标准,一定会谴责日本侵略者。不这样是不可能的。当然,我们历史学家要从事实出发,更不能添枝加叶,不能歪曲历史。

我们这个清史工程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体工程,一部分是基础工程。主体工程就是 3 000 万字的清史,分成 88 卷,基本内容在下次台北会上我再做介绍。这是我们的主要任务,要全力以赴,保质保量地完成,不辜负人民的委托。同时要整理大量的文献、档案,这是基础工程。清朝统治近三个世纪,留下了大量史料,汗牛充栋,光第一历史档案馆就有 1 000 多万件,多得不得了,东西太多了。地方档案还

有1 000万件,四川南充的档案、南部县的档案、内蒙古的档案、西藏的档案。有些眼看就要毁了,怎么办呢?极力抢救吧,我们尽可能整理抢救更多的历史档案。而且档案有满文、蒙文、藏文等少数民族的文字。

清代文献也很多,清人诗文集就有4万种。我们整理多少出版呢?2%就是800种,大概有5亿字,相当于大半部《四库全书》了,汗牛充栋。我们的力量太微弱,我希望团结海内外的学者共同完成这个工作。

我打个比方,修清史是打造一个航空母舰,还要有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等,这样才能组成一个战斗群。我们的主体工程犹如航空母舰,档案文献编译等基础工程犹如巡洋舰、驱逐舰、潜水艇。因为时间关系,其他的我就不详细讲了。

世界视野与清史纂修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员 马大正

中国有历代修史的传统,这个传统绵延不断,经久不息。它所形成的二十四史构成了中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在世界的编纂史上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传统,是“一道非常有特色的风景线”。

纂修清史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标志性学术文化工程。2002年经过详细调研和缜密考虑,认为重修清史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国家做出了启动清史纂修工程的重大决定,用十年或十余年的时间完成。

有清一代历史自1644年清朝定鼎北京算起长达268年。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与现实接近。对今人来说,当代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如政治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发展、民族关系、中外交往,以及人口问题、宗教问题、边疆问题、生态问题、城市化问题、地区发展的平衡问题等等,都与清代有密切的关系。清朝灭亡后,北洋政府曾于1914年开设史馆,为清朝修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历经14年所成的《清史稿》未能尽如人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先后三次动议重修清史。毛泽东同志多次动议清史纂修工作。董必武同志在建国初也曾建议纂修清史,50年代末周恩来同志曾委托吴晗同志考虑纂修清史的规划,1965年秋周恩来同志又委托中宣部负责组成了七人清史编纂委员会,并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清史之机构,但都因种种原因使计划夭折。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转发了一封建议纂修清史的信件,学术界又曾筹议纂修清史,初步拟订了编纂规划,但因时逢改革开放伊始,百废俱兴,万端待理,纂修清史之议,再度搁置。直到2001年,戴逸、李文海等学者再次呼吁纂修清史,得到社会科学界的积极响应。到2002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启动清史纂修工作。

编纂清史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历史任务,是新世纪一项重大的学术文化工程,也是

一个庞大而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我们今天纂修清史既是对中国优良传统的继承,同时,我们也相信,这项工作也必然对当代世界史学的编纂做出贡献。

经过学界的充分讨论,对纂修清史的指导思想形成了四点共识。

一是,清史编纂意义的“两个有助于”的认识,即:有助于人们全面了解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文化,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有助于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更好地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是,清史编纂要做到“三个结合”的认识,即:既要尊重历史事实,又要反映时代精神;既要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又要勇于进行学术创新;既要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又要联系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

三是,清史编纂工作中要做到“三个要”的认识,即:要充分发扬学术民主,提倡文人相亲的新风尚,摒弃文人相轻的旧观念,集思广益;要实事求是,尊重史实,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增强史书的科学性和可读性;要坚持老中青相结合,形成合理的人才梯队结构,注重培养一批优秀的年轻专家。

四是,清史编修要有“世界眼光”的认识,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历史的范畴中去分析、研究和评价,要用世界的眼光,实事求是地认真研究,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着眼于中国历史的发展,更要联系世界发展的进程。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不管自觉还是不自觉、主动还是被动,清朝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全方位地融入了当时的世界发展进程。清王朝的兴、盛、衰、亡无一不是在当时的世界格局里发生的,同时也对当时世界产生了它应有的影响。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清史纂修当中的世界视野,或称之为“世界眼光”呢?根据我个人的粗浅认识,似可从如下三个方面来考察。

第一个方面,清史编纂者要有世界视野。我们要自觉地把有清一代的历史放到世界的背景中来观察、评议和研究。在纂修清史的时候,既要纵向分析,也要横向比较,不能把清朝的历史孤立地放在中国的历史范围内来考察。清朝前期历史中康乾盛世的研究是清史研究中一个热点,对康乾盛世学人研究完全可以各抒己见,结论也可见仁见智,甚至可以否定康乾盛世的存在,但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如果既将它放到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中来考察,又将它置于当时世界发展的大背景来分析,肯定得出的结论会更接近历史的真实:康乾盛世的辉煌,以及辉煌背后隐藏的阴影都是历史事实。同样具备了世界视野,对集封建时期治边政策大成的清代边疆政策的曲折发展历程,也将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才能得出清代的边疆治理未能正确应对由内边防务到外边防务为主的根本性转变,是清代边疆政策由成功到失败的主要原因。大家知道,古代中国疆域之边有“内边”、“外边”之分。统一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

指中央政权对控制薄弱的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范和治理措施。分裂时期的边疆治理,通常是指在政权与政权之间的对峙地区和对边远少数民族地区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古代中国历史疆域内的大小政权的“边”,可称之为“内边”。明代以前的治边主要是针对边疆内部的问题。明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明代的倭患持续了近200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崛起,侵略势力开始东来。17世纪以来,荷兰侵占台湾,俄罗斯侵入黑龙江流域。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殖民主义者用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使我国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一些边疆省区和沿海地区的外患日益突出,出现了边疆全面危机的严重局面。殖民主义的入侵,可称之为“外边”之患。应该说,明代以降,在中国内边防务问题依然严重存在的同时,现代意义上的边防,即外边防务问题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可是清朝统治者面对边疆防务这种变化的形势,仍沉迷于治理“内边”的传统边疆政策而不思防备外患之策,致使清朝前期边疆政策的成功与辉煌很快成了明日黄花,清后期边疆政策的全面破产,是清朝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二个方面,在纂修清史时,要注意历史人物当时的世界背景,或者说,我们笔下的清代历史人物,无论是清朝的中国人还是到清朝活动的外国人,他们是怎样看清朝、看世界的。这些当事人、当时人从不同的视角产生的看法和得出的结论,现在都成了应予重视的史料,我们要从这些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视角所得出的不同或相同的结论中进行分析 and 研究。举个大家熟悉的例子,乾隆末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访问。今天我们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清朝的乾隆皇帝以及手下大臣是如何看待马戛尔尼使团的,怎样分析英国国王派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的缘由,清朝又采取了什么对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丰富、立体的画卷。但仅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重视英方的记载。马戛尔尼使团也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第一手史料,现场纪实。他们的记录为我们留下了当时天朝大国辉煌的一面,也留下了他们所看到的天朝大国辉煌背后的危机。这些记载对我们进一步研究这一历史事件,并由此评论这个时代是非常宝贵的。这个小例子说明,我们在研究清史的时候,要关注当事人、当时人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立场所得出的不同的或相同的结论。因此,曾经在有清一代历史上活动过的外国的当事人和当时人的记述,以及留存在世界各地的有关清代历史的档案,对我们研究清史有特殊的重要价值。我服务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研究边疆的历史是我的主要任务。19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外国探险家到中国边疆地区考察,留下了大量有关当地政治、经济、风土人情、民俗民风的记录,这批记录对今天了解清朝政府在边疆地区的施政,以及当时边疆地区社会的方方面面是非常宝贵的资料。长期以来,这些相关著作或因深藏国内外书库而难